

同性戀研究：
历史、经验与理论

TONGXING LIAN YANJIU
LISHI JINGYAN
YULILUN

王晴锋◎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同性恋研究： 历史、经验与理论

TONGXING LIAN YANJIU

LISHI JINGYAN

YULI LUN

王晴锋◎著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同性恋研究：历史、经验与理论 / 王晴锋著.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7. 10

ISBN 978-7-5660-1409-2

I. ①同… II. ①王… III. ①同性恋—研究
IV. ①C913.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2820 号

同性恋研究：历史、经验与理论

作 者 王晴锋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盛华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3. 75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409-2
定 价 46. 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书写同性恋：历史与研究综述	(12)
中西同性恋现象：一个简史	(12)
后“石墙骚乱”时代的同性恋研究	(25)
国内同性恋研究文献综述	(50)
第二章 同性恋理论：争论与发展	(70)
同性恋研究的范式之争：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	(70)
同性恋理论研究：从标签—互动论、建构主义到酷儿理论	(87)
第三章 同性恋话语与经验	(101)
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之发轫：嵌入性抑或本土性？	(101)
背叛与救赎：男同性恋者的同直婚	(111)
文化缺失、代际差异与同性恋认同模式	(124)
第四章 家庭出柜的文化阐释	(135)
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	(135)
仪式隐喻、社会拟剧与家庭出柜	(149)
第五章 同性恋政治学之反思	(167)
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	(167)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	(181)
红色酷儿理论：同性恋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	(198)

绪 论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同性恋者是以同性为爱欲对象的个体。通常认为，同性恋群体在特定社会的总人口中占有大致固定的比例，这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无论一个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是宽容还是严苛，都不会增加“绝对同性恋者”^①的人数。如果社会环境对同性恋的态度较为宽松，他们更容易公开自己的身份，即出柜；反之，同性恋者则竭力隐瞒真实身份，使社会忽略其存在。由于大都市生活方式的独特性，因此，城市同性恋者所占的比例会比农村相对高一些。在一些大城市，如香港，成立了“1/10会”这样的同性恋组织，美国也有“10%协会”（Ten Percent Society）。^②根据美国2000年人口普查和选举的选民登记信息，同性恋者占美国人口的近5%，即有1000多万人。^③同一时期，有3/4的美国人承认至少有一个熟人是同性恋者。中国大陆的同性恋者数量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2004年12月我国卫生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处于性活跃期的男同性恋者约占性活跃期男性大众

① 通常认为“绝对同性恋”（exclusive homosexual）由生理性因素造成，它又被称为“排他性同性恋”“素质性同性恋”“真性同性恋”等。而由社会心理因素造成的同性恋被称为“境遇性同性恋”，又称“可变性同性恋”。它通常因缺乏异性接触机会而以同性作为代替，这种情况在军队、监狱、单性寄宿学校和修道院、远航水手等单性环境和人群中较易发生。

② 李银河：《性文化研究报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③ 章伯仲、习智明：“同性恋：常见问题解答。”周丹主编：《同性恋与法：“性、政策与法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及资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页。

人群的2%至4%，由此估算中国有500万至1000万男同性恋者。^①如果按照同性恋者占总人口3%的比例估算，那么中国大陆当前的同性恋者数量为4000多万人。^②如果再加上与他们密切联系的生物学家庭与选择性家庭，那么，同性恋者及其影响人群的规模将是非常庞大的。关于同性恋数量的各种说法，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如果性取向确实是一种如阿尔弗雷德·金赛（Alfred Charles Kinsey）所说的“动态连续谱”，那么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人数将是无法确切统计的，因为每个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同性恋或异性恋的性取向“成分”。因此，有关同性恋人数的统计，其政治性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的科学价值。金赛及许多调查显示，同性恋者在社交及心理等方面与其他人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现代同性恋身份的诞生不仅涉及复杂的医学、司法、道德和宗教介入，而且也包含个体自身的自我定义。大体而言，医学、法律、宗教及其他各种非正式的社会力量相互作用和强化，共同参与“同性恋身份”这一世纪性的制造工程。大约从19世纪晚期开始，在医学机构与法律制度的作用下，同性恋逐渐成为不道德的行为、需要矫治的疾病或者社会秩序之破坏者，它对主流的异性恋文化及其设置造成了威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异性恋的支配性意识形态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机制，它渗透在各个角落里，构成弥散性的社会规训之网。它通过不断地谴责同性恋，使之成为需要严加管控和惩治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同性恋—异性恋”的二元对立成为支配性的话语，并将“自然”等同于“正常”，这种社会类别化对同性恋个体的生命历程造成深远的影响。

迈克尔·沃纳（Michael Warner）曾提出“异性恋统制”（heteronormativity）的观念，这种意识形态霸权将异性恋定义为自然发生的和规范

^① 同一时期，刘达临、鲁龙光认为中国大陆至少有3000万同性恋者。参见刘达临、鲁龙光：《中国同性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第47页。另外，1999年至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进行了全国随机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岁至64岁的中国人里，2.0%的男性自我认同为同性恋者，女性则是0.7%。参见潘绥铭等：《当代中国人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31-332页。潘绥铭认为，中国本科生里“绝对同性恋”的男生占3.7%，女生占2.2%。参见潘绥铭、杨蕊：《性爱十年：全国大学生性行为的追踪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大陆的人口数为13.8亿。参见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2017年6月2日访问）。

性的性取向。^① 同性恋统制在父权制的框架下运作，在它的价值体系里，同性恋和女性成为被贬抑和遭压制的对象。一直以来，同性恋统制如铁幕般笼罩着生活世界，同时它又不断地遭到被压迫者的抵抗与突围。早在 19 世纪之前，西方社会的权利结构及其运作模式发生了改变，也即从强调血统遗传、出身显赫、名望继承等转向重视个体后天的学习与勤勉，从权利的“自然”获得与“神授”转向强调权利的争取和个人成就，个体逐渐从阶序等级制度中解脱出来而迈向平等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很多越轨类型不再被视为违反某种规范的罪或恶，而是被看作个体成长失败的表现形式。同性恋与疯癫一样，被视为生理或自我精神的缺陷，它们被纳入医学诊治的范畴进行矫正或规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同性恋个体取代了鸡奸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19 世纪后期 *homosexual* 这个词的发明并不是“同性恋”这一身份类别的创造，而恰恰表明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制造同性恋的宏大历史工程已接近尾声。^②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同性恋运动的蓬勃发展，西方社会经历了“同性化”（*homosexualized*）。^③ 大概从这一时期开始，同性恋者以社会学的方式而不再以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的视角来看待自身，^④ 他们将自己视为少数族群而不再是异常的个体，这种观念的改变深刻影响了异性恋社会及同性恋共同体的发展。

在中国，同性恋现象古已有之，但它一直是父权制体系下的附属物。到了明清时期，它曾一度成为“癖好”甚至“风雅”。在父权制中，女同性恋者、女性之间的爱欲更是被忽略或否定。清末民初，随着西学东渐（包括西方性科学的引入），中国的同性爱欲现象日益纳入西方话语体系而被病理化。在民国时期，伴随着“同性爱”这个词的产生，还逐渐浮现出“同性恋”这种崭新的个体身份。之后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公共领域里关于同性恋的否定性话语逐渐占据支配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余年里，同性恋被斥为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封建余孽

① Michael Warner. "Introduction: Fear of a Queer Planet." *Social Text*, Vol. 9, No. 4, 1991, pp. 3-17.

② Don Mager. "Gay Theories of Gender Role Deviance." *SubStance*, Vol. 14, No. 1, 1985, p. 34.

③ Dennis Altman. *The Homosexualization of American;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mosexual*.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2, p. 224.

④ 这个时期的社会学家也开始对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发展产生浓厚的兴趣。

而遭到严厉的压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艾滋病的出现及防艾形势的严峻性，同性恋者“因祸得福”，官方重新发现并重视同性恋社群的生态。^①到了90年代末，同性恋社群的生存处境明显改善，1997年的刑法修订取消了惩处同性恋的流氓罪，这被普遍视为我国同性恋的非罪化。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分类中剔除，标志着我国同性恋的非病理化。总体而言，中国同性恋已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疾病”“变态”“政治上不正确的性关系”转变成今天的“非病理化”和“非罪化”的主体间人格关系。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层面的交往日渐频繁，同性恋话题也逐渐进入公共话语体系，并成为学术界的知识对象。在这一过程中，很多公众人物坦然出柜，同性恋社群（尤其是大都市的同性恋者）的生存面貌似乎焕然一新。

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仍然有很多人对于同性恋抱有很深的误解和偏见。一方面，他们不愿意接纳身边的同性恋者，不少人依然认为同性恋是（心理）疾病、堕落的生活方式，甚至还有医生怀着各种目的试图“治愈”同性恋者。大多数家长更是难以接纳自己的同性恋子女，在以家庭为中心和主张“孝道”的儒家文化里，“家庭出柜”成为同性恋者在身份认同之后面临的又一极大难题。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在公共话语中又经常沦为戏谑娱乐的话题和窥视、消费的对象。诸种现象表明，同性恋在非罪化和非病理化之后，又面临着被消遣、被娱乐和被庸俗化的窘境。在这种历史与现实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严肃对待我国的同性恋社群，了解他们的历史、生存现状和诉求，并相应地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阐释。

^① 2016年8月8日“关于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8414号建议答复的函”指出，近年来，我国男性同性性行为人群艾滋病感染率上升较快，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率从2011年的6.3%上升到2015年的8.0%。截至2015年底，我国报告存活经男性同性性行为途径感染病例114803例，占全部报告存活病例的19.9%，已成为部分省份大中城市和青年学生艾滋病感染的主要传播途径。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http://www.nhpc.gov.cn/zwgk/jianyi/201611/7bc260b3eda34bbcaf29ee6dc7b67b31.shtml>（2017年6月11日访问）。

二、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 研究内容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的原因,我国的同性恋研究相对较为滞后。但是近些年来,这种局面已经有所改观。本研究试图在梳理同性恋历史的基础上,对同性恋社群进行经验调查和理论阐释。在经验研究方面,主要关注同性恋社群的同直婚、认同模式及“家庭出柜”(也涉及“同妻”现象)。^①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梳理、探讨并反思关于同性恋的各种理论,这些理论包括标签—互动论、建构主义、酷儿理论以及晚近出现的“红色酷儿理论”。

“出柜”通常是指同性恋者在完成自我身份认同之后向他人表露自己的同性恋取向的过程,“家庭出柜”则是同性恋者向亲生父母表明自己的同性恋取向。出柜的过程及结果涉及同性恋者本人的身份认同状况以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因此,身份认同和出柜作为一个中介变量,是联结和反映同性恋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身份认同既影响同性恋个体的精神生活状态,也关涉与他人、社会之间的互动。同性恋者自我身份的产生是通过个体自我反思、考量及社会互动的过程完成的,它是一种关于个体与社会类别关系的理解,它亦包含他人(尤其是“重要他人”)所持有的态度与立场。一个人的自我身份与他的附属身份(如职业、阶级、种族和性别等)之间的关系是互构的,这些不同类别的身份被整合成相对固定和独特的生活史,它们既是个体自我创造又是自我束缚的结构。^②总之,身份政治是同性恋研究的重要议题,本书将深入探讨同性恋话语、亚文化和身份政治。

家庭出柜是绝大多数同性恋者必须直面的问题,即使是那些自我认同

^① “同直婚”是最近几年国内同性恋共同体采用的术语,指同性恋者与“直人”(异性恋者)结成的婚姻。之前,这种婚姻经常被称为“异性恋婚姻”,但这种称呼不妥,因为婚姻双方并不都是异性恋者。“同妻”即男同性恋者的妻子。

^② Steven Epstein. "Gay Politics, Ethnic Identity: The Limits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In Edward Stein eds., *Forms of Desire: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Controvers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87/1990, p. 267.

良好但不向他人出柜的同性恋者，他们仍然面临成家立业、传宗接代的压力，因此，如何策略性地应对父母和家庭成为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此外，出柜可能影响同性恋者周围的人们态度，这对公众支持同性恋权益可能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家庭出柜对中国同性恋社群具有不可小觑的现实意义。本研究亦试图探讨在中国特有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下，“出柜”这一西方同性恋社群的专有术语和实践策略在中国的适用性以及本土化问题。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的视角上，我们采取“主体建构的视角”^①。主体视角强调同性恋主体的话语生产，通过主体叙述来呈现其声音，从而尽可能地避免研究对象的客体化问题。因此，这也是一项同性恋主体性的文本生产，强调本土的“地方性知识”，我们希望在此过程中能够明辨、探求或反思一些中国本土的元素。康奈尔（R. W. Connell）认为，为解码个人实践中的结构性效应，研究的基本单位须是单个的个案。^② 本研究亦结合生活史的研究方法，试图从个人生活轨迹展示约束和机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个体与结构之间的互动。非结构性的个案访谈与实地调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致流失实地调查中的情境性因素，从而兼顾具体情境的特殊性。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个案访谈、（非）参与观察、实地调查等定性研究方法获得有关同性恋社群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借助于大量的文献研究及互联网信息（包括同性恋网站上的一些音频、视频等资料）。^③ 自2009年以来，笔者长期与北京、成都等地的同性恋者保持接触，因此，与被访者大多较为熟悉，对方明确知悉访谈的意图。通常情况下，访谈不设置固定的问题，而是开放式的交流与互动，以期最大限度地获得相关信息。本研究的另一个重要

① 潘绥铭、黄盈盈：“‘主体建构’：性社会学研究视角的革命及本土发展空间。”《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R. W. Connell. “A very Straight Gay: Masculinity, Homosexual Experience, and the Dynamics of Gen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7, No. 6, 1992, pp. 735-751.

③ 原先的研究设计曾希望通过问卷调查来得出一般性结论，问卷设计的意图主要是研究影响同性恋子女家庭出柜的因素，将父母的基本情况以及家庭环境等作为自变量。但是后来通过访谈和文献研究发现寻找这样的关联意义不大，出柜无法简单地用人口学因素来解释；而且非随机抽样的问卷调查还存在样本的代表性、结论的普适性问题。因此，本研究没有进行问卷调查。

资料来源是参与同性恋社群组织的活动。北京的一些同性恋权益组织，诸如“北京同志中心”“同语”等，经常举办向公众开放的公益性活动，它们以讲座、沙龙、观影等形式传授同性恋知识，并提供心理咨询和法律援助。笔者参加了其中某些活动，尤其是“北京同志中心”组织的公开活动和“同性恋亲友会”^①的活动，本研究使用了这些非参与式观察的部分资料。^②非参与式观察法的优点在于不会对同性恋者产生干扰，能够较为真实地观察他们的行为、知悉他们的想法。缺点在于研究样本（个体或群体）的代表性问题，因为参加此类公众活动的同性恋者通常都自我认同良好，并具有强烈的参与与介入意识，其中有很多人是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因此，他们的行为与观念可能并不能全面反映普通的同性恋者或整个同性恋群体。而且他们的很多想法直接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之间存在断裂与冲突，因而在（家庭）出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文化碰撞与阵痛。

我们是站在平等、理解的立场上搜集同性恋社群的经验资料并进行阐释的。尽管在研究过程中力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客观中立，并避免将研究对象客体化，但仍可能存在未能意识到的各种偏误。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按照学术惯例，本书使用的人名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三、研究框架与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历史”“经验”和“理论”三大块，在具体论述时按照不同的主题分为五章，分别为：第一章《书写同性恋：历史与研究综述》、第二章《同性恋理论：争论与发展》、第三章《同性恋话语与经验》、第四章《家庭出柜的文化阐释》以及第五章《同性恋政治学之反思》。每章包含2至3篇论文，以下对这五个章节的论文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① 2008年6月28日，吴幼坚与阿强（被称为“坚强组合”）发起成立了草根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旨在为青年同性恋者与父母之间的沟通搭建一个平台。

^② 这里的“参加某些活动”是指研究者在现场，但没有参与互动，因此，属于“非参与式观察”。

第一章 书写同性恋：历史与研究综述

本章是历史与文献梳理，包含3篇论文。其中《中西同性恋现象：一个简史》主要简单梳理了西方与中国的同性恋历史，旨在将当代中国具体的同性恋实践和关系置于宽广的时空脉络中进行探讨。概而言之，西方的同性恋史经历了从“行为”到“身份”再到“共同体”的转变，而中国的同性恋史则经历了从“男风”到“疾病”再到“亚文化”的转变。《后“石墙骚乱”时代的同性恋研究》一文主要探讨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同性恋研究的理论脉络和关键的同性恋议题，这些议题包括：作为现代性产物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与宗教、艾滋病与同性恋身份/共同体的建构、同性恋家庭与婚姻以及公众对同性恋的态度等。《国内同性恋研究文献综述》一文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不同学科（主要是社会学领域）的同性恋研究进行述评，认为当前同性恋研究主要存在的问题包括：经验研究碎片化、缺乏本土理论建构、偏于同性恋行为与感知（有些仍执念于探讨成因）而忽略结构性议题等。这3篇论文试图对同性恋研究的历史脉络和研究现状进行总体性的梳理与把握。

第二章 同性恋理论：争论与发展

本章主要讨论同性恋理论，包含2篇论文。《同性恋研究的范式之争：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一文主要探讨同性恋研究中的两大基本范式。本质主义认为性取向是自然的、内在的本质，它由先天决定，并独立于社会与历史，不同性态之间无法真正发生转换。本质主义通常以阶段论或线性模型解释性身份的形成过程，而建构主义认为现实是社会性的建构，它反对跨历史文化的性观念，认为性取向依附于文化，是关系性的和非客观的，同性恋是现代性的产物；建构主义否定规范性的社会类别和阶序等级。事实上，本质主义并不一定反对同性恋，建构主义也未必支持同性恋，不同的人群往往策略性地运用这两种范式进行自我辩护。在现实世界中，本质主义与建构主义均无法充分地阐释性取向，自然与文化、先天与后天、生物特质与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着人类性取向的形成与发展。

《同性恋理论研究：从标签—互动论、建构主义到酷儿理论》一文主要探讨同性恋研究中的三种理论，即标签—互动论、建构主义和酷儿理论。与这三种理论相对应，同性恋作为研究对象也经历了“越轨者”、“身

份—角色类别”和“酷儿”的转变。标签—角色理论主要包括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的“同性恋角色”以及约翰·盖格农(John Gagnon)和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的“性脚本”理论。麦金托什的同性恋角色研究和迈克尔·福柯的性话语分析推动了同性恋研究领域建构主义的发展,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产物。酷儿理论挑战传统的同性恋身份与主体政治,反对单一、稳定的性身份,它关注性知识与性实践压制差异的方式,从而试图将同性恋理论转变成一般性的社会理论。

第三章 同性恋话语与经验

该章涉及中国同性恋的话语演变以及当下的同直婚、亚文化等议题,包含3篇论文。《现代中国同性恋话语之发轫:嵌入性抑或本土性?》一文认为,传统中国社会关于同性爱欲之关系性的话语镶嵌在社会权力等级结构中。民国知识分子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同性恋现象,他们处于由西欧病理化的“性科学”话语和传统中国社会相对温和的同性爱欲话语构成的断裂式阐释链中,因此对同性恋的立场是模糊的。对民国时期同性恋话语的研究有两种视角,即强调内生性的本土文化观和强调外生性的现代性视角。民国时期尚未形成清晰的同性恋身份,同性恋者是作为熟悉而陌生的他者出现在公共领域的。

《背叛与救赎:男同性恋者的同直婚》一文主要探讨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之间的婚姻,该文亦涉及同妻问题。同性恋者进入同直婚是社会与文化等因素倒逼的结果,同时,女性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同性恋丈夫之间悬殊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同性恋现象的误解等又是造成当前同妻不利境遇的重要原因。同性恋共同体亦批判这种畸形的同直婚,然而婚内同性恋者有着一套自我阐释的逻辑,同时又深负罪孽感,他们陷于背叛与救赎的伦理困境,期望通过各种方式使肉体与灵魂得到救赎。

《文化缺失、代际差异与同性恋认同模式》一文认为,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的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与传统中国的同性性行为之间存在断裂,这两者之间缺乏传承性。现阶段的同性恋社群缺乏自身独特的亚文化,并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它仍有待于过渡到“形而上”的阶段。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与80、90年代出生的年轻一代同性恋者之间

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同性恋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模仿、“白咖啡与黑咖啡”等方面。在文化缺失的状态下，性行为成为性身份形成的促变因素，并进而影响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老一代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更多是“以性为中心”，而年轻一代则是“以身份为中心”。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可能预示着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转变。

第四章 家庭出柜的文化阐释

本章主要围绕“家庭出柜”这一主题，包含2篇论文。《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及其文化阐释》一文认为，家庭出柜不仅是同性恋者个人的“私事”，也是重要的“家事”。家庭出柜的影响因素包括出柜主体的个体特征、前期铺垫、时机选择、宗教因素以及父母的文化认知和家庭期待等。家庭出柜迫使同性恋者陷于同性欲望与家庭伦理的冲突之中。一方面，由于受传统伦理本位的、以“孝”为核心的礼制之约束，家族主义取向下的同性恋子女认为自己不孝，愧对父母与家庭。另一方面，从儒家关系主义的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关系性的自我观是导致同性恋者与其父母之间产生代际文化冲突的另一根源。孝道、关系伦理、家族主义、文化偏见等要素共同导致家庭出柜成为两代人之间的两难困境。

《仪式隐喻、社会拟剧与家庭出柜》一文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家庭出柜，认为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表现形态与“通过仪式”和“社会拟剧”有诸多相通之处。仪式情境（神圣与世俗）、仪式过程（“分离—过渡—重融”）及其反结构性揭示了家庭出柜的结构与过程，拟剧分析则将家庭出柜置于社会表演的理论范畴，并具体展示了出柜展演过程的各要素，从而使家庭出柜中的阈限状态不再成为认识论上的无结构状态。人类学的“阈限”概念隐含的非结构化、未定义的、突变的特性为探讨规范性的世俗社会结构中身份地位与角色的转变与复合提供了基础。同性恋者在家庭出柜仪式中通过与日常生活世界的分离、叙述、话语争辩与身份争夺等过程重新融入家庭。借助于仪式结构/过程、社会拟剧等理论工具可以展现同性恋者家庭出柜的内部结构及其动态演变过程。

第五章 同性恋政治学之反思

该章是对同性恋研究的反思，包含3篇论文。《同性恋身份、“橱柜”政治与消费主义》一文认为，在强制性异性恋的性政权中，异性恋被认为优越于同性恋，它创造了恐同症主体，甚至导致“自我憎恶的同性恋者”。以既定身份类别为中心的对抗性政治在挑战支配性政体的过程中可能只是一种有限的策略，因为过于强调同性恋身份会抑制其他身份类别。“反规范化”政治将身份理解为管控性欲与差异的手段，认为排他性的身份将产生本质化效应，而且对身份的聚焦难以抓住性政治的丰富内涵。“橱柜”（Closet）的争论和“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的历史神话也反映出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同性恋消费主义与身份政治、社会运动的持续发展存在密切关联，它确实具有巩固和强化同性恋身份与共同体的作用，但个体性的私人消费无法取代进取性的集体政治。

《同性恋研究中的身份政治、亚文化及话语之争》一文认为，全球化背景下的酷儿研究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丹尼斯·奥尔特曼（Dennis Altman）提出的“全球酷儿化”观点，强调跨时空的超稳定结构与同一性；另一种是福柯式话语分析，强调内在特殊的身份与类型。跨国同性恋身份和主体性涉及本土性与植入性之争以及第三世界的同性恋社群在面对西方性话语和性实践时如何自我表达的问题。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并不是平面化、单向度的，而是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西方并非同性恋身份/文化的原点，亚洲和中国的同性恋也非西方的镜像和拷贝。同性恋研究应避免简单的“刺激—反应”身份生成模式。在中国的语境中，“同志”的称谓并没有产生理想的解放效果，它仍然存在话语的竞争与反挪用现象。

《红色酷儿理论：对同性恋政治学的批判性反思》一文指出，在同性恋理论的发展脉络中，酷儿理论对反思同性恋研究起到关键作用，但酷儿理论本身亦充满张力。“红色酷儿理论”结合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阶级分析方法和酷儿理论，是传统酷儿理论的补充和批判性重构。同性恋政治学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的道德神学到后来的医学规训再到后来的同性恋解放的历程，其中二元论是建构身份政治的基础。借助“红色酷儿理论”这一批判性视角可以重新审视同性恋身份政治、“橱柜”的政治神学以及同性恋压迫的本质。

第一章 书写同性恋：历史 与研究综述

中西同性恋现象：一个简史

同性恋既是一种现实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根植于特定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之中。弗洛伊德曾指出，古代人和现代人在性欲方面最惊人的差别在于这样的事实：“古人强调本能自身，而我们强调其对象。古人把本能看得至高无上，甚至不惜因此而抬高低级的对象；而我们贬低本能的本身，只因为对象的价值才找到本能存在的理由”。^① 本文旨在简要梳理西方与中国的同性恋历史，以使后文将要探讨的当代中国具体的同性恋实践和关系置于广阔的时空脉络之中。

一、西方同性恋史：从“行为”到“身份”再到“共同体”

歌德曾说：“对少年的爱与人类一样历史久远”。最古老的关于鸡奸的记载写在一张 4500 年前古埃及的莎草纸上，它表明当时在埃及鸡奸行为颇为盛行，而且人们认为天上的诸神也有这种癖好。^② 在古希腊文学中，最

^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欲三论》，赵蕾、宋景堂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第15页。

^② 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刘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

著名的关于同性恋的作品无疑是柏拉图的《会饮篇》，其写作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16年，当时的悲剧作家阿伽同为庆祝自己的作品取得成功，邀请了几位好友参加一个私人宴会，包括苏格拉底、斐德罗、保萨尼亚斯、爱吕克西马可和阿里斯托芬。根据斐德罗的提议，众人讨论爱神厄洛斯的重要性和力量，由此便有了柏拉图的这部名作。^① 在古希腊，“求爱者”（*eraste*）与“被爱者”（*eromene*）的角色划分表明，男人与男童之间的性关系并非理所当然，它必须与习惯、行为准则、行事方式和各种附属关系相互作用并保持协调一致。在理查德·波斯纳看来，古希腊的男同性恋现象其实是一种变童关系，即成年男子对青春期男孩的性欲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同性恋在当时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阿里斯托芬就非善意地嘲笑过同性恋者。而且，肛交和女同性恋都遭到反对，“被动”肛交者是被人所不齿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都认可同性恋的欲望，但都希望不要把这种欲望付诸行动。^② 古希腊女性也反对长者对少年的爱，对这种男性之间的爱情颇有微词或心生嫉妒。^③ 总而言之，在性爱上，成年男性被男孩吸引，这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他必须自制，不要用身体表达他的爱。这是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的立场。^④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现代同性恋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8世纪早期，当时的荷兰、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形成了独特的前现代同性亚文化景观。例如，伦敦的有些酒馆（*molly houses*）成为男性寻找同性性接触的重要场所。^⑤ 而在这之前，15世纪的佛罗伦萨曾成立特殊的机构监管男性卖淫现象。米歇尔·福柯认为，诸如中国、印度、罗马等社会都有一套“性爱艺术”，它的真相是从快感中抽象出来的，理解快感不是以绝对法律和有用

① 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刘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15页。

② 理查德·A. 波斯纳：《性与理性》，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6页。

③ 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刘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④ 有人曾把苏格拉底和他的弟子的关系与萨福和她的学生的关系进行比较。萨福的生活和诗歌都是以同性爱为主题的，她是迄今为止最早身体力行女同性爱欲的人。她遭到当时希腊人的讽刺挖苦，但并非由于其行为不道德。人们对她浪漫率真的本性并不在意，但她对自我灵魂的坦白和追求妇女从家务中解放出来的思想却成为嘲讽的对象，因为这在当时显得很不合时宜。详见汉斯·利希特：《古希腊人的性与情》，刘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9页。

⑤ Robert Beachy. "The German Invention of Homosexualit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82, No. 4, 2010, p. 802.